

March 2017

New Changes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New Novel's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Jun Zhu

Xun Su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u, Jun, and Xun Sun. 2017. "New Changes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New Novel's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2): pp.19-2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2/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朱 军 孙 逊

摘 要：20 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既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合，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新小说； 国家想象； 儒学转型； 现代性

作者简介：朱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都市文化和近现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zhujun648@shnu.edu.cn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都市文化研究，电子邮箱：sunxun@shnu.edu.cn 本文系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计划“中国语言文学”成果；本文得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资助。

Title: New Changes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New Novel's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Abstract: New Novel's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novel as well as the narrative of a modern nation state. It was related both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ity and new changes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onvergence of the evolution theory in Gongyang studies and that in the West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empor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in Chinese novels, which consequently resulted in the shift from traditional utopians to the imagination of the future "New China". While Chinese writers were introducing western political ideas by writing political novels, they in fact reconstructed the sign system of the nation state based on ideal civilization and ethics. The mutual stimulation between the narrative of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ethnic groups" and the awareness of a nation state in the New Novel played a key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nation, the New Novel reconstructed the popular national discourse by relying on the thought of Great Harmony, and drew a picture for the perfect world — a civilized, universal, and ethical human society. The ori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embodied by the New Novel was a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which was also what Confucianism contributed to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New Novel; imagination of the nation; neo-Confucianism; modernity

Author: **Zhu J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urban cultur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zhujun648@shnu.edu.cn **Sun Xun**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urban culture studies. Email: Sunxun@shnu.edu.cn

晚清时代是国家转型、儒学转型和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下，现实的家

国危机与儒学的天人危机交织在一起，激发了文人重构国家理想的努力。以《新中国未来记》开

篇的“新小说”,将“中国前途”的想象置于中心,^①初步建构了一套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话语体系。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起点和原动力,目前这一研究多被置于西方“现代性”与“乌托邦”的视域之下。但溯及本源,晚清小说家主要还是根据儒学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新小说”的国家想象,不仅来源于域外思想和文类的导入,更受晚清儒学新变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种族革命小说、立宪小说、殖民小说、理想小说等具体文本切入,进一步揭示出“新小说”对国家未来的设计和想象与儒学现代转型的深刻联系。

一、公羊学新变与“新小说” 现代国家想象的展开

“三代之治”一直是传统儒家文人理想的国家治理原型,以公羊学转型为核心的晚清儒学新变中,对“三代之治”的崇法发生了重要偏移。古文家一般主张回归“三代之治”,而今文家则主张继周损益的制度创新。晚清今文家制造的“大地震”和“大喷发”,更源于他们融合中西的“改制”思想和“新”的意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9—82)。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合,展现了人类未来的美好前景(皮锡瑞 8—9)。康有为倡“小说学”,梁启超等领衔的“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首先着眼于“新民”“新国”“新世界”的想象和创构,为从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定位中国拉开了序幕。

《公羊传》不仅是一份解经文本,更是一套有关儒家体制、哲学和宇宙论的经典论述。“张三世”是春秋公羊学的核心要义。《公羊传》提出“三世异辞”——“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表现出“书法义”对三世历史编纂取舍的不同态度。董仲舒把《春秋》所记载的鲁国十二公分别划入“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此为“书法义”。何休将此义生发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系统性的历史哲学,此为“史观义”。在历史书写的背后,是孔子政治意识的渲染,“书法义”“史观义”最终都归结为“政治义”。公羊学定义了三世交替循环的秩序原理,以及宇宙本位的政治观,隐藏着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学的深层

结构。

今文公羊学说在西汉大显其世,其后沉寂千年。1770年前后公羊学复兴,迅速成为知识界“当者披靡”的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羊学逐渐演变出一套新的政治哲学和世界观,成为中国人沟通西方进化论的捷径。从本质上说,公羊学是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三世有兴衰更替,但社会秩序最终仍由先在的宇宙秩序决定,此即董仲舒所谓历史存在于“天人感应”之中。此循环论并不具备现代性的“时间性格”,或曰缺少未来意识,这一情况在晚清公羊学新变中获得扭转。

晚清公羊学因时而变与其改制、变易哲学和“以经议政”的学术风格有关。乾嘉年间,经过庄存与等人的重新发掘,在刘逢禄身上,以三世说为中心的变易观点“大张其军”。受其影响,龚自珍、魏源等人进一步将“进化和变革”的哲学观系统化。魏源直指,“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47—48)。至康有为,“三世说”进一步附丽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和进化论政治学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28)。儒家典籍中包含了最重要的“进化之理”,这也是“万国之公例”,这意味着中国理应变法图强“与世渐进”。中国传统的“古”“今”不分、面向理想“三代”永恒复归的时空观走向裂变,政治想象因此出现种种新的可能。

晚清公羊学新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儒学时空意识的重要转变,回应了西方“现代性”的首要特征——时空分离。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认为“现代性”的首要特征是“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这是现代国家形成的首要“动力品质”和“因素”(18)。现代性断裂中最深刻的部分是“过去”转向“未来”的断裂。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创者梁启超如此阐发三世说与“未来”的关系:“《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即

达尔文)、士啤生氏(即斯宾塞)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梁启超全集》卷1 264—65)。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交融汇通,给“新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激发中国小说的家国想象从三代、桃源叙事转向现代国家叙事。黄金世界不仅仅在唐虞三代,也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新中国”。“进步”则成为儒学新的“天意律令”。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开篇谈到:“我们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作了寓言,凭空结撰了一篇小说。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作为小说材料的”(2)。这些小说在作者看来“不是失之于附会,便是失之荒唐”,反而近来外国人两部小说《未来之世界》和《世界末日记》才算是“别开生面的笔墨”,“编小说的意欲除去了过去、现在两层,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碧荷馆主人2)。如“新小说”发刊词《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所言:“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②夏晓虹因此指出,“未来记”形式的小说具有破天荒意味,中国文学即使偶尔构想理想社会,而绝没有将其置于未来社会提前出世(222)。“新小说”首先将文学的新意聚焦于未来国家想象,起源于对文学传统的叛逆,也是对传统儒学的一个最深层的挑战。

随着“时间开始了”,中国小说现代国家想象开启。小说中涌现出多种纪年方案,有“孔子纪年”“干支纪年”“黄帝纪年”“西历纪年”等等。不同纪年并举背后映射不同国家道路的选择。《新纪元》“黄帝纪年”彰显了小说家的民族主义革命要求;“大清帝国纪年”表明了东海觉我、陆士谔等人保守的维新思路;蔡元培《新年梦》和高阳氏不才子《电世界》中西历法并用,体现了小说家援西入中建设现代国家的意愿;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等力推“孔子纪年”,则更凸显了对于文化和儒学兴灭继绝的使命感。

空间上的“新中国”对应时间上的“新纪元”,构成了“新小说”国家想象的叙事主线。传统儒

学循环论的时空观已经破裂,西方线性的时间进化和民族国家观念对小说创作产生根本性影响,并且深刻影响20世纪至今的政治秩序、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如何弥合新旧时间的断裂,实现据乱世与太平世的空间转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小说”往往采用两种空间叙事套路:“梦游新中国”和“域外漂流记”,并且两种叙事手法经常叠加使用。“梦游新中国”的代表作包括《新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狮子吼》《新中国》《新年梦》《痴人说梦记》等等。《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评《新中国未来记》“全用幻梦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新石头记》唤醒宝玉梦游晚清中国和“文明境界”,突出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富强和落后的新旧对比之维。《新中国》第一回“一枕皇梁乾坤新造”,“我”和李友琴梦中来到“盛极了”的新中国。陈天华《狮子吼》是现代“醒狮论”的先声。小说描绘了混沌—梦醒—光明的三部曲,是据乱世到太平世的转译。卷首楔子直言“运用影射、象征、梦幻诸手法,阐明光复中华的创作主旨”。在现代精神分析的视野中,匮乏感激起的梦境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的体现。福柯《梦与存在》认为,具有预言力量的梦是同一真相的另一种经验,梦的形象世界连接着超越界(32)。小说主人公从逃避“据乱世”进而破除之,睡狮的“混沌之梦”转化为“日月光华”之境,寓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升华。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说:“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宜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③夏志清认为,梁启超这一美学立场可能来源于坪内逍遥“理想派”与“现实派”的两分(夏志清86)。梁启超推崇“理想派”,“理想小说”因此成为重要文类,此“理想”又以“新中国”想象为核心。导游于“他境界”的梦想之旅有效化解了“现实”与“理想”的断裂。

与“梦游新中国”相对应,《月球殖民地小说》《乌托邦之豪杰》《瓜分惨祸预言记》《新野叟曝

言》《冰山雪海》《电世界》《狮子血》等都可归到“域外漂流记”叙事。“新小说”发刊词中即要求“新小说”能“如《鲁滨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故国“无国无史”,能人志士报国无门,只能选择另立新邦。《黄金世界》《狮子吼》《月球殖民地小说》和《电世界》中,从远游海外到殖民月球海底,各种“域外漂流记”叙事层出不穷。旅生《痴人说梦记》最为典型,公羊三世进化观变异为“愚村”(传统中国)——“仙人岛”(世外桃源)——“镇仙城”(现代国家)的时空递进叙事。现代“镇仙城”对阵传统“仙人岛”和“愚村”,不仅充满了挑战的意味,而且形象地展现了从愚昧到启蒙、进化,再到现代完美国家的进程。

梦想式和鲁滨逊式的出走、重建、归来,对应了“新小说”从旧中国到新世界,再转回改造现实中国的叙事模式,公羊学三世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在“新小说”中构成了潜在的沟通。一方面,“梦游”和“漂流”强化了新旧时空分裂;另一方面“新小说”延续了从“据乱世”(救亡)到“升平世”(富强)再到“太平世”(大同)的三世进化叙事结构。分裂与传承的二元对立叙事,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想象,一种进化的天道观支配下的国家想象。正如浦嘉珉所指,达尔文的“进步”(progress)和“完美”(perfection)在晚清儒学中逐渐内化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浦嘉珉 15)。

“新小说”的国家想象,取新旧对立之意,依三世递进之法。作为进化之道的文学具象,“未来记”是“新小说”有别于中国小说传统的特质所在,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重要突破。晚清儒学与西方现代性的化合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其中核心的推动力来自于西方进化论与公羊学进化论的会通。晚清公羊学中的进化与大同观念是“新小说”创作的摹本。以“梦游新中国”和“域外漂流记”为叙事手法,保群进化、救亡启蒙等现实关怀与新儒学视野下的三世进化观形成对应,构筑了“新小说”国家叙事的深层结构。

二、政制与文明:“新小说” 国家想象的“旧邦新命”

1902年被小说史家定位为政治小说年。“新小说”成就最大、影响最大者是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两大新文类,国家想象主要围绕民主和科学

的理想化而展开。一方面,现代政治词汇迅速被“新小说”奉为新的名教;另一方面,转型时代知识人和小说家多主张“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包天笑 391),试图以新儒家的“文明”观念改造西方政制,体现出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晚清政治小说因此多具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

清季以降,由龚自珍和魏源发出先声,邵懿辰、王闿运形成关键枢纽,最终在廖平和康有为身上,公羊学及其政制乌托邦思想蔚为大观,深刻影响了一代知识人的思想与创作。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魏晋文”开篇云,“王闿运治学初由《礼》始,考三代之治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于是大盛也”(27)。通过魏源与王闿运等人的努力,公羊学的历史变易观念与清季的实学传统相互促进。工具理性复苏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魏源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以至于歆慕西方的民主制度。晚清公羊学“理势合一”的实学观,注重“实用”与“时务”,是对“偃钉为汉、空腐为宋”陈腐学风的有力反拨,转变了中国传统中把历史看作道德衰替的循环观念,将历史看作世俗人事长期发展、客观演进的过程。

从廖平到康有为,春秋公羊学和春秋董氏学所代表的“真孔学”复兴,其核心是重拾孔子的圣人改制立法精神。万古不易的历史循环论,改写为“时王(素王)立法”的时代意识。公羊学进一步将“新”与革命、改制相联结。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解释说,“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卷1 2)。

“新小说”国家想象被种种现代政制科学理念所左右。对未来国家的命名主要有:联邦共和国、大中华民主共和国、兴华邦独立共和国、新中国、立宪国、镇仙城、民权村、自由村、汉山、女中华、女子世界、乌托邦、黄金世界、文明境界等等,集中反应了新的政制价值趋向。独立、共和、自由、民权、立宪、革命等现代政制词汇充当起“新小说”重新想象中国的符号体系,成为新的“救世的神符”。事实上,小说家并没有深刻理解现代政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但却往往任意夸大其效用。譬如报癖《新舞台鸿雪记》有一“植物园”,形象地以文明菜、自由果、平等草、独立树、革命花等代表对西方政制的认同,但“国粹药”才是消弭东

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隔阂的药方。新小说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政制理念都趋于道德-政治关怀,一种对“文明”的憧憬。

“新小说”对“文明”的描绘是新时代内圣与外王的接合,旨在重塑意义体系,其中内涵有价值形态、生活方式、礼法制度的重新取向。如吴趼人所说,“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则为《新石头记》”(魏绍昌 194)。《新石头记》的理想国名为“文明境界”。在空间布局上,每区用一个字作符识,即礼、乐、仁、义、智等儒家教义。“东方强字文明”先生居住在“仁字第一区”,宝玉初到此地进入的是“强”字区。这一空间性的结构寓言,首先指涉了作为传统中国“文明”的空间结构。宝玉作为“补情”的情种在晚清转而“补天”,红楼梦从此幻化成富强梦。“文明境界”的一大特色是“文明专制”政体。吴趼人的“文明专制”设想来源于晚清流行的“开明专制”设想,^④但他在构想富有启蒙精神的中央集权之外,更为强调道德和文明的救世力量。

“新小说”对现代政制习惯以“文明”为标尺重新分类,譬如有“文明专制”与“野蛮专制”、“文明自由”与“野蛮自由”等。对“自由”的区分和反思最为典型。《黄绣球》《自由结婚》《新石头记》《新中国未来记》都有两种“自由村”。《新石头记》中,一个“自由村”中“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无疑是“野蛮自由”;另一个“自由村”是“东方文明”诞生的地方,充满“文明自由”。第二十三回宝玉道:“自由也分别文明、野蛮么?”老少年道:“越是文明自由,越是秩序整饬;越是野蛮自由,越是破坏秩序。界乎文野之间的人,以为一经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国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会上的规则,能明法律上的界线,才可以说自由”(吴趼人 174—75)。《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言“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自由不是“不读书、不上讲堂,日日去嫖去饮”,而是能明群己的界限,是内在的公共自由意识。革命的理想不是“自由之俗”,即听任意志与欲望的奔泄实现“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而是“自由之德”,不以侵犯他者的自由作为自己追求自由的目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 45)。

“新小说”甚至将“文明”本身也划分为“假文明”和“真文明”。单纯依靠政治自由、科技昌明、

军事强盛的文明不是“真文明”。《新石头记》中“动不动讲文明的国”,以保护之名任意欺凌,割人土地,侵人政权。这是“发下个号令来吞并各国”的“假文明”。第三十八回“东方文明”以仁的精神重构现代家国理想,“组织成一个真文明国”。现代性往往表现为神魔同在的英雄主义,即史华慈总结的近代世界的“歌德精神”或“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Schwartz 237—39)。此浪漫精神有一种魔性在。“东方文明”所创造的“真文明”,恰恰是要超越政治科学上的戡世精神,淘汰政治上的使命感,剩下文教上的使命感。最终德育普及、世界大同、“补天”成功。魔性的浪漫被素王的德性所驯服,国家、世界被境界所超越,生命在文明中充满了趣味。

总之,“文明国家”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具有向善的典范性。自由、财政、军事、维新等等政制理念皆为标,被小说编入“文明”之本的脉络。陆士谔《新三国》中,魏蜀吴皆行变法,但是魏国吴国只从财政军事入手,这些都是末,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立宪模范国吴国从教育立政入手才是治本之策。第十七回孔明点出关键:“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势急,则不能先治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张正吾编 244)。孔明这段对严复思想的引述表明,道德教育风俗人心是晚清小说家心中国运昌盛的本源。^⑤国家当深维文明之本。

进而言之,对于“文明国家”具体的实现路径,“新小说”往往回归到儒家的道德救世主义。墨子刻精辟地指出,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一是围绕工具理性(世俗化)的现实需要,二是以“道德性语言”或“人文主义”作为文化社会的基础。^⑥“新小说”对于民主政制的铺陈对应了工具理性和宗教世俗化的需要,对于文明和道德的强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两者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新小说”中,此“道德性语言”贯穿于从批判到治理再到重建国家的全过程。譬如《月球殖民地小说》构想了“透光镜”,洗涤因为八股教育缩小的心房以及糊涂病。《新中国》中苏汉民发明“催醒术”“醒心药”医疗“病夫国”的黑心病。如此“中国之心”才能有救。《女娲石》“白十字会”创立“洗脑院”洗涤国民性。小说揭示出从道德

入手医治国家痼疾的重要性,可谓开现代文学“国民性”批判之先声。

对于“道德性语言”的重建,《黄绣球》将道德具体分解为“公德”和“私德”。第二十五回中,在黄绣球的女学堂里,女学生年纪虽小,意识却开通,说道:“把祠堂改为学堂,极是好事。祠堂尽私德,学堂任公德,公德不明,私德就不能表现”(阿英编 349),此“公德-私德互补论”体现出超越同时代的远见。《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进而总结:“诸君啊,须知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气三者具备,但民智还容易开发,民气还容易鼓励,独有民德一桩,是难养成。倘若无民德,则智气两者亦无从发达完满,就使有智,亦不过藉寇兵资盗粮;就使有气,亦不过一团客气,稍遇挫折便都消灭了”(11—12)。与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吁求一致,“开民智-鼓民气-养民德”是梁启超定义的国民道德律的内在结构,也是作为“觉世之文”的“新小说”指出的终极救世道路。

晚清政治小说显然是大于“政治”的,“政制”与“文明”构成了政治小说国家想象的两大维度。这源于晚清“实学”的推动。“实学”的宗旨在于化合中西现代政制,推动儒家理论与道德-政治关怀的重新结合。这一新时代的圣道王功,在晚清“新小说”中突出表现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改制诉求。这是对乾嘉学问在道德性命上内敛保守的反动。“新小说”不再自我规定为“羽翼经史”,而追求“时王立法”,指导新时代的改革。

三、民族与国家:“新小说” 国家想象的“华夷之辨”

1895年后,“合群救亡”和“保国保种”成为最急迫的需求,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形成。儒家的“华夷之辨”发生重要转型并成为“新小说”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资源。“民族国家叙事,借由国族化的历史、文学、媒体与通俗文化,不断地被重述。在这些故事中,民族国家认同被呈现为一种根基性的、本质的、统一的、连续的事物”(MacCrone 52)。“新小说”临危受命,在重建民族国家认同上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谈《新小说》的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

想,激励其爱国精神”。而此时的中国恰恰是“无国无史”之国,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再三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梁启超全集》卷1 449)。梁启超此言点出了传统的“华夷之辨”难以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症结所在。“华夷之辨”多强调一种共同的文化根源和纽带,更像一种“文化主义”,而非坚固的血缘、地缘和政治纽带。

从魏源等人对“夷夏界限”的跨越始,晚清儒学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发生了急速转向。如牟宗三总结清末儒学第三期转型:“自历史文化言,民族国家之自觉的建立以丰富普遍之理性。由道德形式转进至国家形式,由普遍理性之纯主体性发展出客观精神。此皆为儒家精神所易函摄或所易转至者。只须吾人一意识到儒家学术之实践性,则在发展之逼迫中即必然转到此。盖孔孟荀立教,本自人性人伦历史文化而为言。夷夏之辨为儒家所固有”(牟宗三 13)。此中可见,儒家理性精神与西方国家理性存在相互契合的基础,由历史文化之夷夏之辨又最易转至民族国家之自觉建立。

无论是温和的立宪小说还是激进的种族革命小说,都试图从“华夷之辨”中找寻资源重新展开国家论述,并且常与“人禽之辨”相互叠合。正如牟宗三言:“人性人伦所以辨人禽,历史文化所以辨夷夏。此两义最为儒学之本质”(牟宗三 13)。康有为弟子韩文举的《人肉楼》被梁启超认为是民族主义精神最为炽烈的作品之一。所谓“人肉楼”,堪为活地狱的写照。“人肉楼”上坐一少年(光绪),后坐一老姬(慈禧),十余年间,啖“须陀人”数百万,理想的国家和国人对应“华胥国”和“天治子”,现实的中国人却是被吃的“须陀人”,满人则是食人不尽的“扣焦人”。华胥帝最终问罪:“吾种不同须陀,非易烹也。岂有野蛮烹文明者乎?”^①韩文举仇满情绪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以保皇为己命的康有为等人,以至于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特意为之辩解(丁文江等 144),折射出新小说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以及知识人内部的撕裂。事实上,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也有猛烈抨击皇帝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不知五伦不识文字的夷狄贱族”。

在新的“华夷之辨”视野下，晚清政权被《痛定痛》《女娲石》《新年梦》形容为“盗主国体”“贼民国体”，洋人的入侵则被理解为“二次亡国论”。帝国主义的入侵，直接激发了小说“无国”之叹。此“国”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夏”或“华”，而是现代世界版图中的“民族国家”。《瓜分惨祸预言记》哭诉：“世界上便无他的国名了”，“地图上再不能看见我中国的影子了”（岭南羽衣女士等302）。第四回详说有九国洋人如何约定来分中华。《卢梭魂》的黄宗羲虽“姓黄”，却是个“亡国之民”；《黄金世界》数十万旅外同胞同呼“无国之惨”；《女娲石》中翠黛泣歌“棲身何处”，亡国之痛构成晚清文人心中最深处的创伤意识，又进而投射为“新小说”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

重新召唤华夏的精神起源，是“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开始。这集中表现为黄帝神话、女娲神话纷纷在小说中复兴。本宁顿认为“在国族的核心处，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一堆叙事。这些叙事包括国族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国族）英雄的系谱”（Bennington 121）。《狮子吼》借“汉人始祖轩辕黄帝”演说一套民族系谱，“狮子”象征黄帝，虎狼是“逆胡”。与《狮子吼》借梦境隐喻国族起源不同，《瓜分惨祸预言记》更像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第八回华永年见到璇潭乡独立后狂欢场景，不禁悲从中来，细为乡民讲述了黄帝子孙的起源。神话凝固为历史，晚清小说重新将黄帝立为邦国的命符。

女娲神话也是“新小说”民族国家想象所借力的题材。此类题材的兴起原因有二：一是以“补天”隐喻救国救民。《情天债》非常经典地演绎了这一时期小说美学中“情”与“天”的冲突。苏华梦自小立志“嫁给全国人”“他日决不受男子压制”，所有人“为之绝倒”。书中人物都以言自由、黄爱种、真理、罗慕兰、杨国权等等命名，不再是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而是时代的新人。他们既承受了女权主义、民主主义等西潮的洗礼，同时也继承了某种精神历史的遗产。《红楼梦》中秉情的石头本来并非石头，而是匡世济民之心、天伦仁爱之情。以《情天债》《女娲石》《新石头记》为代表的晚清“补天”叙事回到了民族精神史的源流处。

二是女娲“造人”对应着新时代“国民之母”想象，隐藏着从造人到国家再造的叙事结构。索子（鲁迅）译《造人术》的跋文中，萍云（周作人）欢呼：“新造物主之徽号，乃不能不移之以赠我女子，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吾国二万万之女子，二万万之新造物主也。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国人才，于是乎发育。昔有一造物主，而天地清明，今吾国有二万万焉，其结果之宏大，又安可最！华严世界，会心不远”。^⑧《女娲石》序言中说，“我国今日之国民，方为幼稚时代，则我国今日之国女，亦不得不为诞生之时代”（岭南羽衣女士等442）。新时代的“国女”强调自己不仅是“天生的，娘养的，自己受用的”，而是“党中的，国家的。”民族国家的意识覆盖了自然的女性意识，身体成为政治符号。第九回“春融党”甚至要求女性“以色救国”，不忌酒色，不惜身体，专要一般国女，喜舍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说文明因缘。设有百大妓院三千勾栏，勾引得一般“睡狂学生”，腐败官场，无不消魂摄魄，乐为之死（岭南羽衣女士等490）。这未尝不是“新小说”过度宣扬国家主义，将民族国家观念庸俗化、极端化的产物。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与神话的关系有一经典论断：神话就是启蒙，启蒙会随时退化为神话（5）。神话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并且经过文学想象的“自然化”，历史与现实的鸿沟被填平了。借助神话和科学的魔力，“新小说”塑造了一套新的民族英雄系谱。譬如《黄绣球》中的黄绣球、《电世界》中的黄震球、《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华永年和夏震欧、《新纪元》中的黄之盛、《新中国未来记》中的黄克强、《新石头记》中的“东方强（文明）”“华兴（必振）”、《狮子吼》中的狄必攘等等。这些民族英雄都是智慧与勇气兼具、撼天动地的时代新人。从“抵抗外辱”到“宣扬国威”，将自身投射于黄帝、华夏“渺远的过去”，将新中国引向“无边无际的未来”，一个“克敌”“振兴”“强盛”“锦绣”和“文明”的理想国。黄帝女娲神话的复活以及新的民族英雄谱系的植入，都充当了世俗宗教的功能。“新小说”将松散的华夷身份符号凝固为既定的宿命，激发出了国族成员最为深沉壮阔的热情。

“黄白大战”是“新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题材之一。这从《新纪元》1936年前重版八次可以

见出,其中寄予了华夏复兴路线图,可总结为:“被压迫-反抗压迫-独立-压迫别人”。一方面是国家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因为黄帝的命符神圣不可侵犯,才有了因为“黄帝纪年”而引发的世纪大战。黄帝是作者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最大公约数。在民族英雄黄之盛的带领下中国大胜白种诸国。白种被迫签订十二条城下之盟:中国同种诸国均以黄帝纪元,其他有愿以黄帝纪元者不能干涉;华人侨居之地方俱划作华商租界,中国政府拥有治外法权等等。《新纪元》写成于“民族国家”崛起时代,深层的“华夷之辨”心结依然存在,并且隐然有朝贡体系的意味。“新小说”试图在狄夷交侵的时代重建军事、文化的话语权,乃至在民族国家和全球意识下重新界定、解释诸夏与四夷。

《新纪元》《电世界》的“黄白大战”之惨烈,折射出“华夷之辨”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其中蕴含着强烈的“中国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与之相对,《新石头记》《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新年梦》《痴人说梦记》等都预想了“万国和平会议”“弭兵会”的情节,“华夷之辨”深处的共同体意识最终战胜了种族主义的狂暴。《新石头记》第四十回“东方文明”说:“和平会不仅求万国国家和平而已,单求国家和平,是国际上问题,范围未免太小,达于极点,不过免兵衅而已。此和平会当为全球人类求和平,而各国政府,当担负其保护和平之责任。如红色种、黑色种、棕色种,各种人均当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国民。此为人类自为保护,永免苛虐。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凡我文明各国,无论个人、社会,对于此等无知识之人,均有诱掖教育之责任”。又说:“不得以彼为异族、异种,恃我强盛,任意欺凌!故自此次开会之后,当消灭强权主义,实行和平主义”。在军事上,“文明境界”不仅发明了不致命的“仁术”作为武器,更强调对弱小民族的文明化成。帮助弱小国家“脱了羁绊之后,还要设法教育他,开他的知识,教得他具了自立的资格,方算大功成呢”(吴趼人 306—16)。经过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洗礼,“华夷之辨”内部的“文明国家”信仰焕发出真光彩。

“新小说”复述并重构了“华夷之辨”的叙事,从中发掘出了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且建构了一套新时代民族英雄的神话谱系。种族革命

小说以及“黄白大战”叙事有力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忱,同时也夸大了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狂暴的一面。另一部分“新小说”则试图从“华夷之辨”之中找寻到文化认同的资源,以文明、道德的、普世的关怀建构起一套“文明国家”的叙事。全球化的今天,这一“文明融合论”对民族冲突和国家争端的化解有启发意义。

结 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徐徐展开波荡及今。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沟通重塑了中国小说的时空结构,开启了文学现代性的旅程。三世进化说新变将儒家向后看的世界观转化为“进步”的“未来记”,沉淀为“新小说”国家叙事的深层结构。大同乌托邦的创构则将“天下”人间化,借道德理想主义统合救亡与启蒙,建构出“完美”的“仿西方-超西方”国家想象。近代中国文学因此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之外孕育了独特的“东方现代性”。其主要特质包括:

第一,“新小说”所欲建构的是一个“道德-政治-科学”理想国。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将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科学、民族等等现代政制理念凝聚为新的符号体系,并在文明和道德的层次上展开重构和反思。依据道德理性的实践,政治科学的外在超越与儒学的内在超越相互应和,外部制度与内部人格彼此激发。传统儒学的道德形式转进为国家形式,现代国家也因此获得价值性和理想性。

第二,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相对,“新小说”建构了一套“文明国家”的话语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在“新小说”中汇流,续写了新的民族英雄谱系并且重建了民族国家认同。“文明国家”强调在夷狄交侵中守护华夏道德文化传统,民族国家最终归于道德的与文化的,现代性方能不堕落不物化。

第三,“新小说”折射的中国知识人共通的国家远景是一个文明、普世、道德的大同盛世。大同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融、社会主义与素王革命的会通,激发出“新小说”对国家和人类终极愿景的关怀。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同在文学想象与书写中统一起来,人类远景展现为一种超国家的道德秩

序,这一秩序涵括了统一世界共同体中的人类整体。

注释[Notes]

- ①《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梁启超说:“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书卒業,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3。
- ②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8月18日。
- ③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14日。
- ④参见思黄(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报》第1号,1905年12月;饮冰(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3-77号,1906年1月-3月。
- ⑤严复1898年所作《拟上皇帝书》中说:“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65。
- ⑥参见墨子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余英时等:《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88。
- ⑦韩文举:《虞初今语·人肉楼》,《新民丛报》第5号,1902年4月28日。
- ⑧《鲁迅全集》十八卷记“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于上海《女子世界》1905年第四、五期合刊”有误。应为米国路里斯托崙:“造人术”,索子译,《女子世界》第二年四、五期合刊,1906年4月。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A Ying, ed. *Selected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Fiction (I)*. Vol. 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
- [Bao, Tianxiao. *Memoirs in Chuanying Buliding*. Hong Kong: Dahua Press, 1971.]
- Bennington, Geoffrey. “Postal Politic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Natio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Homi K. Bhabh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21-37.
- 丁文江 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Ding, Wenjiang, and Zhao Fengtian, eds. *The Chronicle of*

- Mister Liang Qich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 [Feng, Youla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eng Youl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4.]
- 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 [Foucault, Michel. *History of Madness*. Trans. Lin Zhim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Gao, Pingshu, ed. *The Chronicle of Cai Yuanpei*. Vol. 1.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96.]
-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Trans. Zhao Xudong and Fang We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Host of Biheguan. *New Era*.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 马克思·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 Qu Jingdong and Cao Weido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夏志清:“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晚清小说研究》,林明德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59-92。
- [Hsia, C. T. “Advocators of the New Novel: Yan Fu and Liang Qichao.” *A Study of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d. Lin Mingde.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House, 1988. 59-92.]
- 康有为:《论语注》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 [Kang, Youwei. *Comments on The Analects*. Vol. 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 [Liang, Qichao.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Beijing: Beijing Press, 1999.]
- :《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 [——.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Yinbings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9.]
- :《新中国未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8年。
- [---. *The Future of New China*.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 :《清代学术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 *An Outline of Academia in the Qing Dynasty*.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岭南羽衣女士 震旦女士自由花 轩辕正裔等:《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 自由结婚 瓜分惨祸》。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
- [Lingnanyuyintushi, Zhendannushiziyouhua, Xuanyuanzhenyi, et al. *A Corpus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The East European Woman Warrior”, “Free Marriage”, “A Prediction of the Partition of China”.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1.]
- MacCrone, David. *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ism: Tomorrow's Ancest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 [Mou, Tsung-san. *Moral Idealism*.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2010.]
- 皮锡瑞:《经学通论》第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 [Pi, Xirui. *General Survey of Confucian Classics*. Vol. 4.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 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 [Pusey, James Reeve.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Trans. Zhong Yongqia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 钱基博:《现代文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 [Qian, Jibo.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Wei, Shaochang, ed. *A Sourcebook of Wu Jianre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 魏源:《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 [Wei, Yuan. *Collected Works of Wei Y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6.]
- 吴趼人:《新石头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 [Wu, Jianren. *New Story of the Stone*.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Xia, Xiaohong. *Enlightenment and Communication: Liang Qichao's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 杨扬编:《自述与印象:蔡元培》。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 [Yang, Yang, ed. *Self-narration and Impression: Cai Yuanpei*.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张正吾编:《晚清民国文学研究集刊(3)》。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
- [Zhang, Zhengwu, ed. *The Journal Archives of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Vol. 3.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1996.]

(责任编辑:王峰)